

拉美政治

## 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的天主教会与国家： 隐秘的冲突\*

李超

**内容提要：**墨西哥迪亚斯政府和解政策的实施缓和了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初期双方都从中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但是，这种和解政策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及缺陷，它本身意味着自独立以来墨西哥自由派反教权斗争的停滞。在后续的实践过程中，相关问题随着波菲里奥时期现代性的增长和现代化危机的出现而不断暴露并加深，造成墨西哥的教会问题在这一时期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继续存在并扩大。一方面，和解政策的实施与20世纪初期墨西哥社会问题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墨西哥天主教会的复兴和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后者体现了波菲里奥现代化危机形成过程中墨西哥天主教会试图领导社会变革的决心和愿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增长壮大了世俗的力量，强化了墨西哥社会既有的反教权主义意识形态。上述两个方面的不协调对迪亚斯政府时期的宗教政策及相对和谐的政教关系逐渐构成了潜在威胁，并最终导致墨西哥天主教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和重构的实现。

**关键词：**波菲里奥·迪亚斯 和解政策 政教关系 天主教会 天主教社会运动

**作者简介：**李超，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B976.1；K78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2)03-0096-22

---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课题“独立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编号：19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墨西哥的教会问题由来已久，它肇始于西班牙殖民时期形成的王权与教权特殊共生关系模式，后来教会制度作为旧制度的重要遗产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自独立以来，教会问题始终困扰着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政教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并长期占据着政治舞台。不过，在19世纪最后1/4个世纪里，墨西哥的教会问题似乎突然缓和了下来，这种相对的平静使之成为独立以来墨西哥持续激烈政教冲突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墨西哥的自由派几乎实现了长久以来追寻的政教分离理想，而天主教会也似乎开始被纳入到现代政治体制与世俗化社会之中。不过，1910年革命爆发后，墨西哥的政教关系再度走向破裂。如何认识和理解这段插曲，成为一个相对重要且复杂的问题。从国外学术界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成果来看，宗教问题在革命时期的复现与复杂化并不能解释为一个断裂的历史现象，而是需要更深入地考察19世纪后半期墨西哥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探究这种冲突形成的内在历史连续性，即发现修正派史学家和新文化史学派倡导的现代墨西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隐秘连续性 (*hidden continuities*)。<sup>①</sup>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波菲里奥·迪亚斯 (Porfirio Díaz) 时期的教会问题尚无专门的论述，一般是将其纳入对迪亚斯政府<sup>②</sup>时期各项政策的整体分析之

<sup>①</sup> 关于对墨西哥近代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参见 Gilbert M. Joseph and Daniel Nugent (eds.), *Everyday Forms of State 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Rule in Modern Mexico*,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关于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天主教会与国家关系探讨的主要路径包括传统政教关系领域的探讨，尤其是注重分析迪亚斯政府教会政策本身，以及教阶领导层与迪亚斯政权之间的关系；作为墨西哥革命时期政教冲突形成的历史背景而展开；集中研究天主教会的社会和政治活动，重点考察天主教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影响。参见 Emilo Portes Gil,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ivil Power and the Clergy: Historical and Legal Essay*, México D. F.: Pres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35; Karl M. Schmitt, "The Díaz Conciliation Policy on State and Local Levels 1876-1911",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0, No. 4, 1960, pp. 513-532; Karl M. Schmitt, "Catholic Adjustment to the Secular State: The Case of Mexico, 1867-1911", in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8, No. 2, 1962, pp. 182-204; Alicia Olivera Sedano, *Aspectos del Conflicto Religioso de 1926 a 1929: Sus 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 Mexico: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1966; Robert D. Conger, *Porfirio Díaz and the Church Hierarchy, 1876-1911*, PhD Dissertation, Albuquerque: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85; Randall Scott Hanson, *The Day of Ideals: Catholic Social Action in the Age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1867-1929*, PhD. Dissert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4; Martin Austin Nesvig (ed.), *Religious Culture in Modern Mexico*,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Edward Wright-Rios, *Revolutions in Mexican Catholicism: Reform and Revelation in Oaxaca, 1887-1934*,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rta Eugenia García Ugarte, "La Iglesia y la Formación del Partido Católico Nacional en México: Distinción Conceptual y Práctica entre Católico y Conservador. 1902-1914", en *Lusitania Sacra*, No. 30, 2014, pp. 15-52.

<sup>②</sup> 目前学术界以“波菲里奥时代/时期”表示1876—1910年这一历史阶段；如果涉及具体的政府或政权，则一般用“迪亚斯政府/政权”来表示。

中，或者是作为墨西哥历史上反教权主义运动的背景来展开。<sup>①</sup> 这些文章对波菲里奥时代教会问题的诸多方面并没有展开较为具体的论述，导致对这一历史时期墨西哥现代性增长与天主教会变迁历史的认识有简单化的倾向。研究这一时期墨西哥现代性急速增长与日渐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政教关系本身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大革命之后墨西哥政教关系的历史走向。

本文尝试在回顾迪亚斯政府宗教政策转向的基础之上，分析这一时期墨西哥天主教会的革新与成长，以及墨西哥社会问题加剧背景下天主教社会运动兴起与发展的历程，重点考察现代性增长之下各种相关力量或意识形态与和解政策背后的冲突，以期较为完整地呈现这一时期墨西哥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归纳这一时期墨西哥教会问题的主要历史特征，并揭示迪亚斯政府宗教政策背后存在的一些潜在问题及其历史影响。

## 一 迪亚斯政府宗教政策的转向

19世纪后半期，墨西哥政府的教会政策出现较大的转变。重建的共和国时期，墨西哥政府的教会政策经历了先放松后收紧的过程，迪亚斯政权则选择与天主教会媾和，以妥协求团结。

### （一）重建的共和国时期政府教会政策的反复

1867年，以华雷斯（Benito Juárez）为代表的墨西哥自由派彻底击败了国内的保守势力以及法国侵略者，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了国家，自由派的激进反教权主义事业告一段落。为缓和社会矛盾，尽快恢复生产和重建社会秩序，华雷斯政府不得不改变先前对天主教会的激进立场，在社会改革问题上也开始趋向保守。在教会问题上，华雷斯政府除了继续坚持推行社会世俗化、教会财产国有化等措施之外，也开始尝试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与务实的策略，将部分反教权主义的法律条款交由地方政府实施，对神职人员的部分违法行

<sup>①</sup> 参见金计初：《论波菲利奥·迪亚斯》，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第63-72页；张家唐：《论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的兴亡》，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51-53页、第64页；顾蓓：《论反教权运动与墨西哥的现代化》，载韩琦、张鹏、董国辉主编：《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0-159页；韩琦、李超：《墨西哥革命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及其评价》，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23-31页。

为也不予追究。<sup>①</sup> 华雷斯的转变，一方面是出于争取教会保守势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墨西哥的教会问题已经无足轻重，它已经由先前的“改革战争”<sup>②</sup> 而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sup>③</sup>

但是，华雷斯的继任者莱尔多（Sebastián Lerdo de Tejada）并没有继承他的这部分主张，反而对天主教会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莱尔多政府严格实施各项法律，强烈反对教团活动，驱逐修会的教士，没收教会的财产，并支持新教的传播。此外，政府还将所有“改革法”<sup>④</sup> 编入 1873 年新宪法之中，1874 年年底制定的《机构改革法》重申了对政教分离、宗教宽容、民事事务管辖权、教会财产、教育、教士服以及教堂以外宗教活动场所等问题的规定。<sup>⑤</sup> 莱尔多在宗教问题上的激进倾向造成严重的后果，部分自由派担忧联邦政府权力过大而忧心忡忡，教会则不断抗议并试图寻求反对派的政治支持，结果是反对莱尔多政权的各方势力开始集结。在这之中，墨西哥天主教会选择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的叛乱。<sup>⑥</sup>

## （二）迪亚斯政府教会和解政策的确立

莱尔多政府的强势中央集权损害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1876 年他的政权被来自瓦哈卡（Oaxaca）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推翻，从此开始了墨

① Robert James Knowlton, *The Disamort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 Ecclesiastical Property in Mexico, 1856-1910*, PhD Dissertation,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 1963, pp. 516-588.

② 改革战争（1858—1961 年）指 19 世纪中期以华雷斯为代表的墨西哥自由派掌权后，为解构教会和军队等保守势力特权而引发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战争。1855 年 11 月开始，自由派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剥夺教会和军队特权的改革法令，如关于诉讼程序的《华雷斯法》《关于禁止世俗和教会团体占有不动产的法令》（又称“莱尔多法”），《1857 年宪法》，旨在限制教区费的《伊格莱西亚斯法》（Ley Iglesias）等，上述法令引发了教会等保守势力的叛乱，最终导致了三年改革战争。

③ Richard N. Sinkin, *The Mexican Reform, 1855-1876: A Study in Liberal Nation-Building*,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79, p. 144.

④ 改革战争期间华雷斯自由派政府于 1859 年颁布的一系列激进反教权主义的改革法案，统称“改革法”。“改革法”规定：政教之间彻底分离，对教会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禁止公务人员出席宗教活动，查禁一切修道院并废除女修道院的见习制度，教区费实行自愿缴纳，婚礼世俗化，实行出生、婚姻、死亡等民事事务登记制度，离婚合法化，禁止教士经营墓地，等等。参见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466-467 页。

⑤ Ministerio de Gobernación, *El Siglo Diez y Nueve*, 14 de diciembre de 1874.

⑥ 部分学者认为教会对迪亚斯的叛乱给予了财政支援，参见 Francisco Bulnes, *El Verdadero Díaz y la Revolución*, México D. F.: Eusebio Gómez de la Puente, Editor, 1920, pp. 90-91; Emilo Portes Gil,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ivil Power and the Clergy: Historical and Legal Essay*, México D. F.: Pres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35, p. 79.

西哥历史上著名的波菲里奥时代（1876—1910年）。这一时期，墨西哥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较为长久的和平与稳定，早期现代化正式启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伴随着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是世俗化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持续扩展，以及墨西哥天主教会适应性变革与复兴的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悖论是：墨西哥现代化的增长与天主教会的复兴同时出现，而其结果是墨西哥的政教关系逐渐从相对和谐稳定走向了下一阶段的全面对抗。

迪亚斯新政权成立之初便面临着如何处理教会问题的难题。迪亚斯上台之初，便调整了包括教会政策在内的许多内政方针。为寻求政治稳定，迪亚斯继承了华雷斯后期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对教会的态度大为缓和。一方面，政府在法律上继续限制教会的活动，在教会财产国有化、社会生活世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教权主义条款成为悬挂在墨西哥天主教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另一方面，迪亚斯对天主教会开始采取“和解政策”，在大部分时期中搁置或者忽视关于教会问题的部分法律条款，对许多神职人员的违法活动也不加限制，以此来调和自由派和教会势力之间的矛盾，扩大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1881年，迪亚斯与天主教徒罗梅罗（Carmen Romero Rubio）完婚，随后，在其妻子宗教顾问的安排下，迪亚斯与天主教会领导层达成秘密交换协议：教职的任免须先经过迪亚斯同意，条件是默许不再实施之前反教权主义的法律条款。<sup>①</sup> 这表明迪亚斯政府获得了教职人员的推荐权，实际上确立了迪亚斯政权与墨西哥天主教会的非正式和解，以及墨西哥天主教会接受并拥护迪亚斯世俗政权的安排。法律上的限制与具体政策实施上的和解对墨西哥天主教会产生了双重影响，教会领导层接受了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和解方案，不再激进地抗拒世俗政权，教士开始不断释放善意，普通的信徒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三年之后，普埃布拉（Puebla）主教甚至开始呼吁辖区内的信徒庆祝墨西哥独立日，充分表现了教会对和解政策的认可。<sup>②</sup>

除了上述和解政策之外，对这一时期教会与国家关系起到决定性影响的

<sup>①</sup> [美]亨利·派克斯著，瞿菊农译：《墨西哥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36-237页。

<sup>②</sup> Don M. Coerver,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nciliation: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Mexico, 1867-1884”, in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32, No. 1, 1990, pp. 69-70.

另一个因素便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迪亚斯政府<sup>①</sup>在“科学家派”<sup>②</sup>的主导之下，鼓吹“秩序与进步”，其施行的治国策略主要包括：照顾外国资本尤其是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加强墨欧联系，以平衡美国的影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为国家现代化进程创造必要的条件。<sup>③</sup> 迪亚斯的上述每条治国方略都对墨西哥政教关系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伴随美国资本而来的是新教势力在墨西哥的扩展，天主教会的反美意识逐渐增强，教派问题日益复杂化；伴随欧洲势力的进入，实证主义等反教权主义思想开始向整个中产阶级扩散，反教权主义意识形态日渐激进化；伴随现代性增长而来的则是墨西哥世俗化的不断推进，天主教会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城市中开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上述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一时期教会与国家关系复杂化，并加剧了政教冲突的可能性。

与19世纪中期墨西哥自由派推行的激进反教权主义政策引发的冲突和战争相比，这一时期的宗教和解政策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这种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一种和解与宽容的氛围下，墨西哥天主教会不再激烈地对抗世俗政权，而是主动选择转向推动自身的革新，参与教派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墨西哥天主教会内部的温和势力开始崛起；迪亚斯政权则获得了来自天主教会领导层的政治支持，从而提升了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望，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统一和国内稳定，为墨西哥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墨西哥天主教会似乎与波菲里奥时代特殊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政教关系也从前期的异常脆弱和敏感走向相对稳定和正常化。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迪亚斯能够持续有效地维系威权统治的基础之上。随着迪亚斯政权中后期现代化危机的出现和加剧、天主教会的强势复兴以及天主教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对这种威权统治基础的维系变得愈发艰难。

---

<sup>①</sup> 包括曼努埃尔·冈萨雷斯过渡政府。1880年，迪亚斯第一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将总统位置交予冈萨雷斯。1884年，冈萨雷斯任期满后，迪亚斯再次出任总统，后多次连任。大革命爆发后，迪亚斯于1911年5月被迫辞职。

<sup>②</sup> “科学家派”为波菲里奥时代形成的统治集团，该集团主要由内阁官员和知识分子组成，奉行实证主义的施政纲领。

<sup>③</sup>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 二 和解政策下墨西哥天主教会的革新与复兴

19世纪中期的改革战争、墨美战争以及反法战争等引发的混乱与冲突，严重冲击了墨西哥天主教会的特权和实力。不过，这种局面很快得到改观。墨西哥天主教会领导层在和解政策的刺激之下，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教会内部和精神事务，在此基础上，天主教会势力开始复兴，它首先开始于宗教、经济和社会领域，最后逐渐扩展到政治事务领域。

### （一）墨西哥天主教会革新与复兴的具体表现

墨西哥天主教会的复兴表现在多个领域。这种复兴首先表现在天主教会的内部革新和成长之上，主要包括神职人员的培训、教堂的修缮与新建、教团和修会活动的增多、教区制度的完善等。这一时期，墨西哥教士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教士素质出现明显的提升，教士的宗教感情和对世俗社会的敌意不断强化，神职人员与民众的联系尤其是与乡民的联系更加紧密。为解决教士培养问题，教会新建了众多的神学院，改善了培训的课程。另外，为解决神职人员相对不足的问题，天主教会还大量引进国外尤其是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教士。教士数量由1895年的3576名增长到1910年的4533名。随着政府归还部分教会财产和新教堂的修建，教堂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由1878年的4893座增加到1910年的12413座，增幅达153%。<sup>①</sup>修道院、修女院、修会重新开放，教团活动复兴，尤其是耶稣会的复兴最为明显。此外，在教宗和罗马教廷的指导之下，墨西哥天主教会还调整了国内各地的教区结构，恢复和完善了受战争冲击的教会体制，并频繁召开教区会议。<sup>②</sup>

在天主教会与社会关系方面，教会重建了慈善机构，其经营的医院、孤儿院、收容所及其他慈善机构大有起色。教会的教育事业不断壮大，并且通过教团和修会保持了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教会同时还掌控了部分舆论媒介，尤其是新闻出版行业。当时天主教会支持创办的综合性和地方性报刊如《墨西哥之音》（1870—1909年）、《时代报》（1883—1902年）、《国家报》

<sup>①</sup>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57页、第612页。

<sup>②</sup> Enrique Dessel (ed.), *Historia General de la Iglesia en América Latina, Tomo 5 México*, Salamanca: Ediciones Sígueme, 1984, pp. 264 - 265, pp. 280 - 285.

(1899—1914年)等刊物异常活跃,读者群体庞大。这些报刊矛头经常指向政府的社会政策或教会认定“不合理”的法律法规。<sup>①</sup>在与教民的关系上,尤其注重吸纳农民和女性群体。由于政府土地政策的不合理性,大部分农村地区普遍处于乡村凋敝、乡民困苦的状态。许多教士选择扎根农村传播福音,巩固和加强教会在乡村地区的领导地位。天主教士还特别注重对女性的传教活动和教育,并希望借此影响他们的家庭和子女。<sup>②</sup>这一时期,墨西哥女性与教会的联系日趋紧密。另外,墨西哥的修女院尤为兴盛,在吸引了大批本国女性的同时还收留了不少外来人员,当时甚至成了欧洲流亡神职人员的避难所和天堂。<sup>③</sup>

在教会财产方面,迪亚斯政府对于教会获得财产不再严加禁止,包括对铁路、矿山、电报系统、制造业的财产所有权。<sup>④</sup>教会还通过教士之间的土地赠予、教士或信徒上交土地产品、将土地赠予教会指定之人、委托经营等途径占据土地,但其呈现形式却是私有形式,从而规避法律。<sup>⑤</sup>据统计,这一时期,墨西哥天主教会通过各种途径累积的财富总值高达8亿比索,仅普埃布拉一地,教士就拥有200处不动产。<sup>⑥</sup>这样,在财产权问题上,墨西哥天主教会绕开了法律的限制,它不但恢复了部分被剥夺的财产,而且不断扩展其势力。

此外,一些违背法律规定的宗教户外活动也不再受到严格的限制。部分教士开始身着教士服公开活动,组织教徒游行和参加庆典活动,教堂钟声不受严格管制,人们也可以举行宗教婚礼。<sup>⑦</sup>教会高层与政府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如瓦哈卡大主教吉洛—萨瓦拉(Eulogio Gillow y Zavala)成为迪亚斯的

① Enrique Dessel (ed.), *Historia General de la Iglesia en América Latina, Tomo 5 México*, Salamanca: Ediciones Sígueme, 1984, pp. 271 - 273.

② Edward Wright - Rios, *Revolutions in Mexican Catholicism: Reform and Revelation in Oaxaca, 1887 - 1934*,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4.

③ Luis Cabrera,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exico*, New York: Las Novedades, 1915, pp. 14 - 15.

④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11-612页。

⑤ Luis Cabrera,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exico*, New York: Las Novedades, 1915, pp. 10 - 12.

⑥ Emilo Portes Gil,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ivil Power and the Clergy: Historical and Legal Essay*, México D. F.: Pres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35, pp. 86 - 87.

⑦ Karl M. Schmitt, "The Díaz Conciliation Policy on State and Local Levels 1876-1911",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0, No. 4, 1960, pp. 520 - 525.



密友和重要的智囊团成员，甚至作为政府代表出席1884年新奥尔良国际博览会。<sup>①</sup> 为了加强天主教会领导层与迪亚斯政权的联系，墨西哥大主教德拉巴斯蒂达—达瓦洛斯（Pelagio Antonio de Labastida y Dávalos）流亡归来后，还在吉洛—萨瓦拉的引荐之下担任迪亚斯一家的告解神父。<sup>②</sup> 在部分宗教活动或者准宗教活动（宗教会议、宗教庆典、主教葬礼等）中也不乏政治家的身影。上述部分公开的宗教活动实际上打破了法律对教会问题的相关规定。

## （二）墨西哥天主教会革新与复兴的后果及影响

在迪亚斯政府的相对宽容与天主教会内部革新势力的努力之下，墨西哥天主教会在经历了自由派反教权主义运动的严重打击之后，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和更新，并且以一种隐蔽或公开的方式恢复了它的部分世俗权利，重建了部分财产，恢复甚至提升了教会在民众和社会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与其在政治领域中受到一定的压制相比，教会在其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甚至是呈现出“再征服”的现象。虽然有些不合时宜，墨西哥天主教会的复兴表现出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对世俗社会的强大适应能力。这样一来，19世纪中期自由派反教权斗争取得的部分胜利果实被天主教会经济社会势力的复兴所取代，再加上墨西哥天主教会长期干预国内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历史传统，一个显著的后果是：墨西哥天主教会随着自身实力的快速恢复和增长，其试图突破法律限制的欲望以及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兴趣也日益增强。

但是，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天主教会复兴是一种相对有限的复兴，它并未达到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高度，也不能确保教会顺利地参与或领导社会改革事务。这种有限的复兴使其在牢牢掌控农民阶层和女性群体的同时，也加速失去城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支持。墨西哥的男性尤其是男性精英的天主教信仰并未能变得十分牢靠，相反他们的反天主教思想在新思潮的影响之下，显得异常强烈。从影响力的区域分布来看，天主教会牢牢掌控了墨西哥中西部广袤地区，但北部由于美国资本和新教文化的扩张，南部由于土著人口信仰复杂等缘故，天主教在这两地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例如在尤卡坦，

<sup>①</sup> Karl M. Schmitt, “Catholic Adjustment to the Secular State: The Case of Mexico, 1867–1911”, in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8, No. 2, 1962, p. 189.

<sup>②</sup> Robert D. Conger, *Porfirio Díaz and the Church Hierarchy, 1876–1911*, PhD Dissertation, Albuquerque: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85, pp. 69–70.

半个多世纪来都没有像样的宗教服务。<sup>①</sup>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土著人口的地理分布、天主教会领导层的策略选择以及现代性的增长等因素关系较为密切。农民、城市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教会的不同态度影响到即将开展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总体来看，在迪亚斯统治下，教会权势和地位较之改革战争之前一落千丈，而且基本没有直接和有组织地干预国家政治事务，而是成了“专制政治的工具”。<sup>②</sup>

不过，这并未能妨碍墨西哥天主教会改革战争之前美好过去的怀念以及对世俗权力的觊觎。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越来越向着有利于教会的方向发展，教会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关注开始明显增多。19世纪90年代，教会通过关注社会事务顺利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尤其是墨西哥革命爆发前后，这一趋势不断加强，天主教会中的活跃人士更加积极活跃地参与政治活动。

### 三 现代化危机的形成与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

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建立在迪亚斯政府和解政策及天主教会自身革新与复兴的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罗马教廷的指导和欧美各国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启发，并随着墨西哥现代化危机的出现和加剧而不断发展和壮大。这一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墨西哥天主教会突破了法律上规定的政教分离等基本原则，最终瓦解了和解政策与相对和谐的政教关系。

#### （一）教宗利奥十三世《新事物》通谕

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自由主义时代到来对天主教会的冲击可谓前所未有。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展开和城市化的推进，一方面，天主教会面临着在世俗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困境，各种进步思潮对天主教价值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自由放任的政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日益凸显，社会问题逐渐增多，阶级对立开始加剧。欧美各国越来越多的信徒开始行动起来，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以改善劳工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们基本上遵循四条行动路线：用基督教原则挑战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建立基督教社会机构以缓解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痛苦，支持组建工会，号

<sup>①</sup> Wilfrid Hardy Callcott, *Liberalism in Mexico, 1857-192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183.

<sup>②</sup> [美]亨利·派克斯著，瞿菊农译：《墨西哥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37页。

召国家出台旨在改善工作条件的法律。<sup>①</sup> 在英国、美国、德国以及部分南欧国家，信徒的这种尝试和努力尤为显著。

面对近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思潮与新问题，天主教会知识分子和罗马教廷一方面极力捍卫基督教原理及其价值体系，尤其是注重对新近流行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个人主义等与天主教价值体系相背离的“谬误”进行理论上的批驳；另一方面，强调教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应该发挥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呼吁改良，倡导合作。1864年，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威廉·伊曼纽尔（Wilhelm Emmanuel von Ketteler）出版了《劳工问题与基督教》一书，他在该书中倡导用基督教原理解决社会危机，这部著作对教宗劳工思想的形成影响重大。

为应对危机和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需求，历任教宗在不同的通谕中对上述新思潮和新问题均有所回应，但侧重点不尽相同，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教宗庇护九世1864年的《谬说要录》（Syllabus Errorum）、教宗利奥十三世1878年的《宗座职务》（Quod Apostolici Muneris）以及1891年的《新事物》通谕（Rerum Novarum）<sup>②</sup>等，尤以《新事物》通谕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新事物》通谕中，教宗利奥十三世在极力批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时，倡导阶级合作，呼吁各地教会关注劳工问题，建立天主教劳工组织，以改善工人群体的生活和劳动条件。1901年，教宗在关注基督教民主的通谕（Graves de Communi Re）中进一步强调教会在民众社会中的作用。<sup>③</sup> 罗马教廷希望世界各地天主教会能够积极行动起来，以缓和自由主义时代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防范社会冲突的爆发。

威廉·伊曼纽尔之思想和教宗的呼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响应，在墨西哥尤其受到教会活跃人士的欢迎。1895年3月7日，墨西哥记者桑切斯·桑托斯（Trinidad Sánchez Santos）公开颂赞教宗的主张：“在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缺乏活力和改革精神的年代，《新事物》通谕引领着摩西教徒在沙漠中的朝圣之路，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自此之后，教宗的主张在墨西哥开始得到广泛响应。同年，瓜达拉哈拉的一部宗教档案汇编中还收录了一封教宗写给西班牙塔拉戈纳大主教的一封信，呼吁立即召开宗教会议以解

<sup>①</sup> [美] 布鲁斯·雪莱著，刘平译：《基督教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5-472页。

<sup>②</sup> 《新事物》通谕又译《新事》通谕、《劳工问题》通谕等。

<sup>③</sup> 上述文件英文文本可见网站 <https://www.papalencyclicals.net/>. [2021-04-25]

决宗教和社会问题。<sup>①</sup> 教宗的呼吁加上大批海外深造回国神职人员的亲历观感，使得《新事物》通谕的思想在墨西哥教士群体中广泛流传开来，其中的部分主张和观点对墨西哥的天主教社会运动形成了较强的指导意义。

## （二）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后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严峻的危机，迪亚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尽管取得了物质上的繁荣与进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负面效应日渐凸显，最终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失地农民和城市劳工的处境日趋艰难。迪亚斯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措施并未能改变大多数债役农和工人的悲惨处境，相反，土地的集中与资本的贪婪无序酿成的恶果进一步加深了劳工群体的苦难。对于所谓的繁荣与进步，墨西哥教会人士多持批判的态度，尤其是教会内部的不妥协派和激进人士。面对国内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部分活跃信徒从教宗的呼吁以及德法等国天主教社会运动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一方面关注民间疾苦和社会问题，批评迪亚斯政府的各项社会政策；另一方面，着力组织宗教会议，广泛动员信徒和民众，并着手领导社会改革。他们广开舆论，频繁造势，在广泛宣传和使用威廉·伊曼纽尔和教宗利奥十三世《新事物》通谕思想的同时，极力批评政府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尤其是其导致的恶果——大庄园制的扩大和低工资制的盛行。在部分信徒看来，迪亚斯和“科学家派”的经济政策导致市场和国内经济的极端恶化，社会弊病丛生，以至于到了“如地狱般令人毛骨悚然的境地，它是贫穷、不平等、劳资冲突、激进主义和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一个亟待被清除的怪兽和恶魔”。<sup>②</sup> 这种政策危害国家主权，导致“墨西哥的基础设施被外国资本所控制，铁路、工业和贸易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sup>③</sup> 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债役农的处境更是可怜，大庄园里债役农的待遇“甚至都比不上庄园里的牲口”。<sup>④</sup> 教会的这些指责是有依据的，20世纪初墨西哥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极端恶化，农村失地人口骤增，产业工人工资与物价水平极不协调。

<sup>①</sup> Alicia Olivera Sedano, *Aspectos del Conflicto Religioso de 1926 a 1929: Sus 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 Mexico: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1966, pp. 31–33.

<sup>②</sup> Richard Weiner, “Trinidad Sánchez Santos: Voice of the Catholic Opposition in Porfirian Mexico”, in *Mexican Studies/Estudios Mexicanos*, Vol. 17, No. 2, 2001, pp. 323–325.

<sup>③</sup>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18页。

<sup>④</sup> David C. Bailey, *! Viva Cristo Rey! The Cristero Rebellion and the Church-State Conflict in Mexi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4, p. 15.

墨西哥天主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无处不在，为了统一思想和整合各地的行动，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劳工问题，召集宗教会议便提上了日程。从1903年开始，天主教会分别在普埃布拉（1903年）、莫雷利亚（1904年）、瓜达拉哈拉（1908年）以及瓦哈卡（1909年）召开了四次宗教大会，这些会议的内容包括：谴责各类与天主教价值体系相背离的“谬误”，探讨这一时期墨西哥社会问题形成的根源与解决方案，寻求发挥教会作用的具体方式，形成处理劳工问题的具体方案，讨论改善教会教育的具体措施，关注印第安人、女性、儿童教育和童工问题等。会议号召成立工人组织、同业公会、建立信贷合作社；关注工人阶级及其子女教育问题，提倡设立农业、艺术与贸易学校及技术学校；呼吁雇主善待工人，保证休息日，付给工资而不是物品券，反对合同欺诈；关注印第安人问题；呼吁改善公共卫生，反对酗酒、非法同居等问题。1904—1906年，为解决农业问题，墨西哥天主教会又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大会，关注农业生产、农民的道德和物质状况以及农业劳工等问题。<sup>①</sup>

这些所谓的宗教会议虽然大部分针对的是具体问题，但其隐含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在上述会议中，天主教会中的活跃人士通过对劳工和土地等具体社会问题的关注，以改善工作条件和劳工待遇为由，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改革纲领。这一社会改革纲领虽然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但却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仿佛成为治愈20世纪初期墨西哥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它形成于墨西哥革命爆发之前，既不认可自由派或迪亚斯政权的部分社会政策，也不赞同激进派的主张；既要解决迪亚斯政权后期的社会问题，又要防患革命和阶级冲突的来临。这样看来，天主教会版本的社会改革计划充满了调和与理想化的色彩，反映了波菲里奥时代天主教会势力的复兴，以及现代化危机形成过程中天主教会试图领导社会变革的决心和愿望。虽然这一时期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倡导的社会变革计划并不针对迪亚斯政权本身，在策略上也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并不涉及夺取政权的问题，但这种关注还是引起了“科学家派”和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警觉。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前后的混乱局面和权力真空为上述愿望的实现创

---

<sup>①</sup> 关于这几次宗教会议的具体内容，参见 Alicia Olivera Sedano, *Aspectos del Conflicto Religioso de 1926 a 1929: Sus 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 Mexico: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1966, pp. 34-38; David C. Bailey, *! Viva Cristo Rey! The Cristero Rebellion and the Church-State Conflict in Mexi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4, pp. 16-18.

造了条件。天主教会中的活跃人士一方面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则抓住契机成立政党，进一步向政治领域渗透。其中较为重要的组织包括 1911 年成立的天主教工人联合会（CCCO）以及国家天主教党（PCN）。天主教工人联合会以组织和协调已有的各地天主教工人团体为己任，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在 1913 年于萨莫拉（Zamora）举办第二届会议时已联合了 50 个地方支部的 15539 名会员。<sup>①</sup>在这次大会上，门德斯·梅迪那（Alfredo Méndez Medina）神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题为“墨西哥社会问题”的演讲，决定组织独立的天主教工人运动，并形成了改善劳工状况的具体纲领。<sup>②</sup>国家天主教党则以“上帝、国家和自由”为口号，以全面实现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基本纲领为目标，顺利成为革命初期墨西哥天主教会的核心政治组织。<sup>③</sup>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兴盛起来。

波菲里奥时代后期和革命初期，墨西哥天主教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显著增多并不断加强，这种趋势彻底打破了法律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也实际上瓦解了迪亚斯政府既定的宗教政策。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对教会的发展以及政教关系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其价值取向上分析，这场运动存在着内在矛盾性，它一方面要求以基督教价值理念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又激烈地抗拒着世俗政权，意图借由天主教社会运动重建墨西哥社会，防止世俗化进程中宗教被边缘化。这种对世俗社会欲迎还拒的态度使得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既具有大众性，又具有反现代性。<sup>④</sup>

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派和迪亚斯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方案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相对无力，教会则主动担负起世俗的责任。这场运动的兴起表明革命到来前夕的墨西哥天主教会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因循守旧、顽固维护自己特权的组织，而是成为一个新兴的、富有斗志的、在民众中颇具威望和号召力的改革派教会。改良后的墨西哥天主教会在复兴的基

<sup>①</sup> Alicia Olivera Sedano, *Aspectos del Conflicto Religioso de 1926 a 1929: Sus 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 Mexico: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1966, pp. 39–40.

<sup>②</sup> Randall Scott Hanson, *The Day of Ideals: Catholic Social Action in the Age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1867–1929*, PhD Dissert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4, pp. 132–133.

<sup>③</sup> 国家天主教党的思想和具体主张主要体现在其纲领性文件上，参见 Berta Ulloa and Joel Hernández Santiago (eds.), *Planes en la Nación Mexicana. Libro Siete*, México: Edición del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1987, pp. 96–98, pp. 170–172.

<sup>④</sup> Edward Wright-Rios, *Revolutions in Mexican Catholicism: Reform and Revelation in Oaxaca, 1887–1934*,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4–27.

础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劳工、土地改革和教育等社会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并且在政府行动之前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农会和教育组织，使得天主教会可能成为推动墨西哥社会变革运动的一支重要竞争力量。然而，天主教会的社会改革计划同自由派或革命精英试图推行的社会改革方案似乎并不兼容。在基督教原理指导之下的社会变革计划的原则、策略、行动路线与革命者的国家重建计划极为不同，天主教社会运动的这种理念和实践使其成为1910年革命和国家重建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天主教会则成为革命政权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甚至是唯一的竞争力量。<sup>①</sup>而且，政教双方之间的这种竞争具有排他性。美国学者奎克（Robert E. Quirk）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政教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原因时鲜明地指出，1926年政教冲突的发生不是因为教会干政，也不是像一些天主教人士所想象的“革命者是布尔什维克分子”，而是由于政教双方都想控制墨西哥民众，并且都不肯分享这种控制权。<sup>②</sup>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天主教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政教关系的历史走向。

#### 四 现代性增长下反教权主义意识和活动的加剧

迪亚斯统治时期，墨西哥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物质文明的进步带动了部分阶层民众观念的更新与社会世俗化的进一步深化，现代性文化逐步形成。现代性的增长通常意味着宗教的衰落。<sup>③</sup>尽管这一时期墨西哥天主教会在一个相对友善的政治环境中实现了自我更新，但在失去官方宗教的地位之后，世俗化的扩展不可避免地冲击了教会以及固有的政教关系。从意识形态来看，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社会的反教权主义思想并没有因为和解政策的实施而削弱，相反却不断得到强化，传统自由主义的复兴、新教的传播

<sup>①</sup> Stephen J. C. Andes, "A Catholic Alternative to Revolution: The Survival of Social Catholicism in Postrevolutionary Mexico", in *The Americas*, Vol. 68, No. 4, 2012, p. 534.

<sup>②</sup> Robert E. Quirk, *The Mexican Revolution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1910-1929*,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43-144.

<sup>③</sup> 西方经典世俗化理论认为，现代性即对宗教的否定，现代性的增长意味着世俗性的扩展和宗教的衰落，后世俗化理论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部分修正。关于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演变可参阅[美]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宁喆：《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评宗教社会学的三种后世俗化论述》，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55-75页；李向平等著：《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理论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

以及实证主义的盛行，导致社会观念领域的新思潮与天主教在观念和价值层面上的冲突日渐加剧。不过，迪亚斯的政治专制主义以及对各种宗教势力的和解政策使得这一时期墨西哥教会问题变得隐秘起来。

### （一）传统自由主义的坚守与复兴

墨西哥传统自由主义与天主教教权及价值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在墨西哥自由主义者看来，天主教教权和价值体系始终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和世俗社会的巨大障碍，国家应该在清除这种障碍中发挥关键作用。<sup>①</sup> 从迪亚斯统治时期墨西哥传统自由主义的流变来看，尽管这一时期墨西哥的自由主义呈现出保守和实用主义的特征，但在基本理念上并没有抛弃反教权和建立世俗现代国家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随着现代化危机的形成以及和解政策下天主教会公开社会活动的增加而不断强化。

墨西哥的自由派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迪亚斯的独裁，但他们并不完全认可迪亚斯对教会的和解政策。其中的大部分人依旧坚持反教权主义的基本立场，时常批评教会和教士公开违反有关反教权主义法律条款的活动和越来越受罗马教廷的影响，强烈谴责教权的复兴。在联邦政府，被自由派和“科学家派”控制的议会和政府各部门继承了华雷斯反教权主义的历史遗产，坚持法理上的反教权主义不退让，继续制定和推行关于教会财产国有化、公民民事生活世俗化、教育世俗化的各项反教权政策和法律。天主教会本来寄希望于籍支持迪亚斯政变，彻底取消或修订华雷斯和莱尔多当政时期制定的反教权主义法律，但这种尝试并未取得成功，他们将其归咎于政府内部自由派官员的阻挠。<sup>②</sup> 来自教会的责难不无道理：迪亚斯政府内阁成员、老自由派人士拉米雷斯（Ignacio Ramírez）继续公开抨击天主教会和教权<sup>③</sup>；在地方上，激进人士挑战了迪亚斯政府对部分神职人员公开违反法律规定的宽容态度，如在杜兰戈、科阿韦拉、瓜纳华托、圣路易斯波托西、萨卡特卡斯等地，违反

<sup>①</sup> 黑尔（Charles A. Hale）认为，墨西哥传统的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较强的欧陆传统，尤其是在处理教权问题上，参见 Charles A. Hale, “Jose Maria Luis Mora and the Structure of Mexican Liberalism”,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5, No. 2, 1965, pp. 196 - 227.

<sup>②</sup> Emilo Portes Gil,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ivil Power and the Clergy: Historical and Legal Essay*, México D. F.: Pres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35, p. 80.

<sup>③</sup> Ignacio Ramírez, “Reformas Políticas y Reformas Sociales”, 1879. <http://www.memoriapoliticademexico.org/Textos/5RepDictadura/1879RPS.html>. [2019 - 05 - 06]



法律规定的一些户外宗教活动参与者遭到地方政府的严肃处理。<sup>①</sup>天主教会领导层一方面接受并忽视这些法律和冲突，专注于宗教和教育事务；另一方面对上述损害教权的行为提出了持续的抗议。上述抗议和冲突的存在反映了迪亚斯的宗教政策在地方上的部分失效，也表明和解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诸多阻力，这种阻力的强大与自由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但由于传统自由主义者并不是迪亚斯政权的核心政治力量，这种抗议在早期并没有对和解政策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不过，迪亚斯统治后期墨西哥传统自由主义运动复兴之后，这种威胁逐渐加大。1900年之后，受教会活动的刺激以及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传播的影响，自由主义呈现出反教权主义激进化的倾向，由激进自由派组成的墨西哥自由党（PLM）重新发起了以反教权主义为纲领的政治活动。<sup>②</sup>1906年，重组后的自由党在其公布的纲领中激烈地抨击当时墨西哥天主教会和政治和社会活动，将其斥为“冥顽不化的叛徒、罗马教廷的附庸、自由国家不可调和的敌人”，并明确提出了限制教会活动的具体主张。<sup>③</sup>传统自由主义的复兴以及自由党活动的激进化，一方面威胁并削弱了和解政策的倡导者及决策者的权威和能力，另一方面重构了两大和解对象——传统自由主义和教会保守势力之间的关系，最后使得迪亚斯政府的教会政策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自由党人和天主教社会运动拥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扩大化。

## （二）新教的扩展与教派问题

新教的传播和新教思想的扩展同样强化了这一时期民间的反教权主义意识，威胁到墨西哥天主教会，冲击了迪亚斯政府的教会政策。新教在墨西哥的传播与自由派政府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密切相关，新教徒一开始就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形成了天然的政治联盟，而墨西哥民间社会则弥漫着一种反新教的情绪。这一时期，得益于墨西哥宗教宽容政策的确立、墨美关系改善以及铁路建设的加快，新教在墨西哥传播较快，并实现了制度化的存在。尽管新教徒在墨西哥人口中并不占多数，但其对激进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贡献较大。

<sup>①</sup> Karl M. Schmitt, "The Díaz Conciliation Policy on State and Local Levels 1876-1911",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0, No. 4, 1960, pp. 524-525.

<sup>②</sup> William D. Raat, "Ideas and Society in Don Porfirio's Mexico", in *The Americas*, Vol. 30, No. 1, 1973, p. 47.

<sup>③</sup> Programa del Partido Liberal, *Regeneración*, 1 de Julio de 1906. <https://memoriapoliticademexico.org/Textos/5RepDictadura/IM/1906%20Jul1Regeneracion-PPL.pdf>. [2021-04-25]

除了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差异外，新教传播在意识形态和教育两个层面威胁到墨西哥天主教会：墨西哥的新教教徒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致力于培育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文化，反对天主教和宗教狂热；在实践上，则同实证主义者一道对教会教育形成冲击。这一时期，新教徒掌控了政府教育系统中的许多重要职位，并且受到迪亚斯和“科学家派”的青睐。迪亚斯甚至亲自主持了墨西哥城基督教青年联合会（YMCA）大楼的揭幕典礼。<sup>①</sup>

新教在墨西哥的传播以及政府在对待教派问题上的偏颇，导致19世纪墨西哥教派冲突不断。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冲突已经十分明显。新教徒认为天主教信仰助长狂热愚昧，天主教徒则呈现出强烈的反美和反新教情绪，对新教的扩张深表忧虑。在墨西哥天主教徒眼里，新教思想就等于世俗化和亵渎上帝，威胁国家统一和独立；政府同扬基佬<sup>②</sup>使团的密切合作，目的在于去基督化以及为美国政府吞并墨西哥作前期准备。<sup>③</sup>萨卡特卡斯的主教一度公开呼吁辖区内的天主教徒反对新教。<sup>④</sup>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的教派冲突异常激烈，在克雷塔罗和墨西哥城等地甚至发生了反新教徒的暴力和流血冲突。<sup>⑤</sup>

除了教派冲突之外，新教徒对迪亚斯政府的态度到后期也出现较大的变化。尽管这一时期迪亚斯和“科学家派”在处理教派矛盾问题上明显偏袒新教，但他们还是会经常抗议政府对新教徒保护不力，尤其是1905年之后随着墨西哥社会危机的加深和天主教会社会活动的增多，新教徒对迪亚斯政权的总体态度开始出现巨大的转变。<sup>⑥</sup>另外，这种偏颇的态度也招致了天主教会和部分地方官员的诸多不满。墨西哥的民间社会，尤其是在忠实的天主教信徒中，反新教的情绪更加强烈。

① Wilfrid Hardy Callcott, *Liberalism in Mexico, 1857-192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178; [美] 迈克尔·C. 迈耶、威廉·H. 毕兹利编，复旦人译：《墨西哥史》（下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509页。

② “扬基佬”指代美国，此称谓当时具有与反美主义相关的政治侮辱性。

③ Jean A. Meyer, *The Cristero Rebellion: The Mexican People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1926-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5-27.

④ José María del Refugio Guerra y Alva, “A los Católicos de Esta Ciudad y de Toda la Diócesis: Salud y Paz en Nuestro Señor Jesucristo”, 5 de agosto de 1870. <http://www.memoriapoliticademexico.org/Textos/5RepDictadura/IM>. [2019-05-06]

⑤ Karl M. Schmitt, “The Díaz Conciliation Policy on State and Local Levels 1876-1911”,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0, No. 4, 1960, pp. 525-532.

⑥ Deborah J. Baldwin, *Protestants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Missionaries, Ministers, and Social Chan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 176.

### (三) 实证主义的盛行与世俗教育的扩大

较之新教,实证主义对天主教会意识形态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实证主义主张秩序与进步,强调经验和理性,蔑视宗教和迷信,其在意识形态上与宗教格格不入。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在波菲里奥时期,实证主义成为墨西哥的主流政治思潮,墨西哥的实证主义继承了部分自由主义思想。以巴雷达(Gabino Barreda)、谢拉(Justo Sierra)、布尔内斯(Francisco Bulnes)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抨击天主教会的社会作用,否定教会教育,提倡科学教育。布尔内斯还批评迪亚斯政府的宗教和解政策,反对天主教会的经济和社会主张。<sup>①</sup>部分实证主义信徒则实践孔德“人性宗教”的理想,成为世俗宗教的信仰者。<sup>②</sup>这一时期,实证主义强化了反教权和建立世俗国家的立场,同教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教育理念和实践领域。

在教育问题上,由“科学家派”和实证主义者倡导推行的世俗教育与天主教会主导的教会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竞争。墨西哥的实证主义者将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看作是改善公民道德、构建民族性以及实现国家进步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教育问题备受重视。“科学家派”执政之后,墨西哥政府加强了对教会长期统治的教育领域的干预力度,在组织领导、资金支持、师资培养等方面加强了投入,强制推行世俗的公共教育。为推动教育改革,1888年议会通过立法将免费义务教育推向全国。此外,在教育领域,实证主义者还联合新教势力,试图彻底改变天主教会长期掌控墨西哥教育体系的局面。墨西哥政府的世俗化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甚至成为这一时期“墨西哥所有行业中增长率最快的”。<sup>③</sup>得益于迪亚斯的和解政策以及墨西哥天主教会的自我革新,天主教教育也不甘落后。随着私立教育活动空间的扩大,天主教会试图构建全国性的天主教教育体系,尤以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与莫雷利亚三地的教会教育发展最为典型,后两地天主教学校的入学人数据说超过了公立学校。此外,尽管公立学校中宗教教育受到严格限制,教会还是绕开了法律的规定,渗透到公立教育之中,部分来源于天主教师范学校

<sup>①</sup> Karl M. Schmitt, “The Mexican Positivists and the Church – State Question, 1876–1911”, in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8, No. 2, 1966, pp. 200–213.

<sup>②</sup> William D. Raat, “Ideas and Society in Don Porfirio’s Mexico”, in *The Americas*, Vol. 30, No. 1, 1973, p. 42.

<sup>③</sup> [美] 迈克尔·C. 迈耶、威廉·H. 毕兹利编, 复旦人译:《墨西哥史》(下册),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第485页。

的教师留住学生在课外时间教授宗教知识。<sup>①</sup> 教育领域的充分竞争引发了双方的相互攻击，公立学校贬低教会教育导致愚昧落后，教会学校则谴责世俗教育的反宗教性。教会还试图通过改进教学内容和形式，例如增加艺术和体育类课程，开设礼拜日学校等途径来争夺儿童和劳工。教会还操控舆论，攻击世俗教育会导致“墨西哥民族性丧失”。<sup>②</sup> 这种论调反映了教会和实证主义者对民族性内涵认识的不同，双方的冲突则体现了两种发展道路的差异。

实证主义的盛行导致墨西哥天主教会中的反实证主义情绪异常强烈。为应对实证主义在意识领域带来的威胁，墨西哥天主教会一方面强化对私立学校的控制，另一方面，还通过各种途径公开谴责实证主义。在他们看来，实证主义使国家背离天主教精神，诱发物质主义、无神论、社会主义、醉酒和色情等“邪恶”的社会问题，是教会的敌人。<sup>③</sup> 这一时期实证主义通过推广新式教育，强化了墨西哥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思想，而在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大都成为反教权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如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从一定程度上讲，实证主义指导下的世俗教育强化了墨西哥社会既有的反教权主义意识形态，成为20世纪上半期墨西哥激烈政教冲突的根源之一。

上述问题反映了波菲里奥时期社会和观念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也体现了迪亚斯政府教会政策下被掩盖的问题以及和解政策的内在矛盾性，这种矛盾既体现在联邦和地方政府对具体教会事宜的不同处理方式之中，也体现在各种进步思潮与天主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或不协调。保守派、自由派、新教徒、科学家派、天主教教士之间相互攻击，并且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和解政策表现出一定的不满。另外，社会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相关的争论或冲突之中。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虽然未能对波菲里奥时期政教关系形成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隐秘的冲突却构成了对政府现有教会政策的一种潜在威胁。

<sup>①</sup> Karl M. Schmitt, “Catholic Adjustment to the Secular State: The Case of Mexico, 1867–1911”, in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8, No. 2, 1962, pp. 191–198.

<sup>②</sup> Wilfrid Hardy Callcott, *Liberalism in Mexico, 1857–192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182–183.

<sup>③</sup> Wilfrid Hardy Callcott, *Liberalism in Mexico, 1857–192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178; William D. Raat, “Ideas and Society in Don Porfirio’s Mexico”, in *The Americas*, Vol. 30, No. 1, 1973, p. 50.

## 五 结语

伴随着波菲里奥时代政治、经济的变迁，墨西哥天主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一，政教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迪亚斯掌权之初，墨西哥天主教会和新政权刚刚迈出战争和混乱的泥潭，双方都寻求依靠彼此，公开对抗让位于和解与妥协。后来政府掌握了处理宗教问题的主动权，能够较好地实施和推进和解政策。但到20世纪初期，随着迪亚斯政权合法性的不断削弱以及动荡混乱局面的到来，政教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失衡的危险，而双方内部不妥协派的增长导致墨西哥的政教关系几乎处于破裂的边缘。其二，新教在墨西哥的加速传播与扩展使教派关系更加复杂化，墨西哥天主教会不仅要面临同国家政权的竞争，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其他宗教团体的压力；对迪亚斯政权和政教关系而言，如何处理日趋严峻的教派矛盾和冲突也逐渐提上日程。其三，这一时期物质文明的繁荣、现代化的极速增长导致部分民众的生活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善，他们的信仰也趋向于多样和复杂化，墨西哥广袤乡村和城市民众的信仰出现了明显的对比，尤其是实证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盛行，城市资产阶级群体中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之间的冲突逐渐加剧。其四，这一时期，墨西哥天主教会改变了以往联合保守派上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策略，转而更倾向于广泛地动员民众和信徒来干预政治和社会事务，这种方法和策略上的转变导致墨西哥国家、教会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使得墨西哥天主教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具备了有限的合理性。其五，较之于19世纪中期政教之间的公开对抗和斗争，墨西哥的教会问题在波菲里奥时代呈现出新的历史特征，它在一个更深入的领域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展开。迪亚斯政权看似解决了教会问题，实际上却借由和解政策使之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从这一时期天主教会在世界和拉美各国的境遇来看，上述变化中有的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则受制于波菲里奥现代化模式的影响而呈现出较强的独特性。

上述教会和国家关系变化的出现和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迪亚斯政权的和解政策与现代性的增长。从宗教和解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历史影响来看，其内在矛盾性必然导致教会和国家关系的恶化。和解政策实际上表明19世纪自由派反教权主义运动的停滞，它并未能在这一历史时期深入到天主教价值体系当中，甚至呈现出部分的倒退。迪亚斯以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和改革派的

身份攫取了国家政权，而后却出于务实政治的需要，实际上取消了部分自由派反教权主义运动的成果。墨西哥天主教会在和解政策的刺激之下，逐渐恢复了实力和信心，并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观念，教会问题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而且随着墨西哥民族国家的构建而日趋严重。与波菲里奥时期其他的政策相似，和解政策掩盖了墨西哥现代化及世俗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部分亟待变革的社会问题由于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而被搁置起来。这种忽视社会结构变革的、政治专制统治下经济自由化的现代化模式既带来了现代性的增长，推动了世俗力量的成长和天主教会的复兴，同时也引发了现代化危机。现代化危机则重新唤起天主教会以及墨西哥各阶层的政治热情，由危机而来的是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迪亚斯政权的垮塌。换言之，迪亚斯的和解政策虽然实施效果良好，却暗含弊端；天主教会的复兴和社会运动虽然野心勃勃，却也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现代性的增长和现代化危机的形成则提供了重构教会和国家关系的动力。

总体而言，迪亚斯政府的宗教政策自始至终并未能充分满足政教双方内部不妥协派的要求和愿望，双方的这种不满很少表现在直接的冲突和对抗上，而是体现在对民众的争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冲突之中。随着政教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激进派的崛起，和解政策下隐秘的冲突持续地存在且不断加速生长，最终瓦解了这项政策本身。迪亚斯将更为严峻的教会问题抛给了20世纪上半期的革命政府，而这一时期墨西哥教会与国家的潜在冲突对革命政府的教会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责任编辑 黄念）